

摆脱媒体局限实地考察中国

□本报记者 小乐



■王磊/摄

美国著名大学的教授们是如何教中国课程的?他们在教学中有哪些体会?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和东亚系双聘教授、东亚研究项目主任艾尔曼(Benjamin Elman)先生(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科学史和中华帝国晚清教育史)应本报之邀,谈了他的感受。

艾尔曼教授开设了针对本科生的“中国的文化社会史”、“中国和亚洲在西方的形象”、“中国历史”和针对研究生的涉及中国的经典文献工具书、中国的教育史、中国的科学史以及中国的物质文化与技术等课程。艾尔曼教授与他人合著了一本世界史教科书《分分合合》(Worlds Together, Worlds Apart)(2008),并编辑了一部在线的中国经典文献工具书录(Classical Historiography for Chinese History),具体网址请参见: <http://www.princeton.edu/~classbib/>

记者:您在美国给学生讲授中国历史,请谈谈您的教学感受 and 理念。

艾尔曼:我们的学生总体上对中国的认识多源于一般报纸,对中国的历史了解的也不多,包括华裔学生。我们要让他们知道,中国的历史与21世纪无法割裂,无论是从汉唐到宋明这一辉煌期,还是后来发生的历史。尤其重要的是:什么原因(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甚至还有人口学方面的一些问题)导致中国在近代走下坡路?如今,中国又重新发展起来了,那么,21世纪的中国与18世纪乾隆时期的中国、与宋代的中国有什么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革?全球历史大背景下的中国在每个朝代有何特点,它们与世界历史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历朝历代的中国在政治、文化等各方面与国外有什么关系,朝鲜、美国等国家派了哪些人到中国? 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希望学生了解的。

21世纪的中国非常重要,与中国打交道是不可避免的。在我上大学的时候,社会上和学校中对中国关注不多,在那个年代(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和美国是敌人,彼此也缺乏沟通与了解。但是现在情况大有改观,我们已经不再是敌人了,而且两国间关系也日益密切。当然,了解中国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对付中国,而是要厘清大国的发展历程和对中国有更客观的了解。这些学生都很聪明,今后他们不一定搞历史,会在政界、企业界和社会其他各个行业工作,并产生各

种影响。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多一点、更客观一点,这对国家间的友好互信与世界更好的发展都很有裨益。

另外,我们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着两大主要问题:一是语言障碍,二是有着较强的先入为主的观念。首先是语言。这些大学生大多中文功底不深,研究生就好多了。我们很希望学生们能够用中文来研究一些问题,但是这对大学生而言较难做到。当然,也有一些学生的中文不错,还用中文写毕业论文。但总体上,学生因语言问题,在资料阅读与研究方面受限较大,特别是在一些领域,英文资料的局限性比较大,而且译成英文的版本可能与原来的不相符,比如杜甫的诗译成英文后,就失去了很多原汁原味的东西。

还有一个问题,许多学生在上大学前就带有很多偏见,这些偏见来自家里、朋友和社会等渠道。我们要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让他们知道,不应该按照原有的印象,要根据客观实际重新构建正确的认知。当然,现在有很多人有机会去中国大陆、台湾、香港,还有新加坡等,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美国,这些都有助于促进更加客观的认识。

教会中国学生局外人身份看中国

记者:在您看来,教授中国学生与美国学生有何不同?

艾尔曼:最近几年,我每年都会来上海复旦大学给学生上课。在与中国学生接触的过程中,给我感触最深的是如何让他们学会从局外人的角度来审视中国。既往作为一个局内人,从内部看中国,似乎什么都知道,但这不是一个全面的回答。我可以把一些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介绍给学生。在方法论方面,我一向强调要疑古,这一点很重要。中国学生往往比较容易相信并接受一些通常的观点,习惯于被告知应该这样做、那样做,这一点中国台湾和香港的学生也有一定的相似性。要教我们的学生学会怀疑。当然,也有人说我们已经怀疑太多了,我们需要学会相信,但是这可能会导致轻信,而这将十分危险,容易无法正确认识客观真相。比如,今天下午我上课的内容是让学生看一段材料,关于何炳棣与杜维明的辩论,我不会告诉他们谁对谁错,要学生通过看材料并自己作出判断,这十分重要。

海外中国学研究

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定位中国文化

□乐黛云

长期以来,有些学者习惯从“欧洲中心论”角度来分析世界各种文化。如今,西方人文主义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也促使学者重新思考如何定位世界各种文化的问题。正如法国当代大儒汪德迈在《五经》研究与翻译讨论会上指出的那样,西方人文主义的人权思想曾被看做是完美的,然而,现在西方人文主义正面临着后现代化的挑战,对此,学者们迄今还无法给出一个正确答案。

回顾“轴心时代”重观中国文明

雅斯贝尔斯曾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认为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及创造的一切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始于再思考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回忆一次次为新的进步提供了精神力量。如今,后现代化对西方人文主义的挑战则引发了思想界对“新轴心时代”的呼唤。在“新轴心时代”的呼唤中,中国、印度和欧洲备受世界各地学者的关注。一方面,这三个地区是“轴心时代”的原点;另一方面,目前它们正经历着大转变,有新的“复兴”机会,它们“新的飞跃都基于对轴心时期的重新认识,并被它燃起新的火焰”。

因此,重新探讨文化源头,重视原始

经典将是应有之义。中国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因种种历史及其他方面的原因,曾一度被冷落甚至忽视,现今却日益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反省自身文化,强调要通过中国这个“他者”来反观自己,呼吁要“摆脱种族中心论”,借助了解中国、借鉴中国历史文化的经验来发展他们自身的文化。

儒家思想具有普遍性的当代价值

其中有一部分西方学者强调应思考儒家思想,它或许能为人文发展指引一条道路,例如“天人合一”蕴含的尊重自然之思想,“远神近人”提倡的拒绝宗教之完整主义以及“四海之内皆兄弟”之博爱精神。不少汉学家,如史华慈、安乐哲、郝大维都存在类似看法——安乐哲与郝大维在《通过孔子而思》一书中强调,他们要做的不只是研究中国传统,更是要设法使之成为丰富和改造他们的世界的一种文化资源。这些汉学家提出,儒家从社会的角度来定义“人”,这是否可用来修正和加强西方的自由主义模式?在一个以“礼”建构的社会中,能否发现可利用的资源,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哲学根基不足却颇富实际价值的人权观念?

自20世纪简帛的出土,再一次引起了西方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的关注,在美国达慕思大学还专门召开了一次国际学术会议,讨论《郭店楚简》,在学界引起

颇大反响。自20世纪末在西方“中国学”的“简帛热”到今天《五经》研究与翻译问题,大概会成为“海外中国学”(或“中国学”)的一个新领域和新视角。这一研究甚至可能会为世界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开创新局面。

当然,无论是西方学者对儒家思想的再思考,还是他们对中国古代文化的重新认识,主要是希冀从中国文化中寻求可用来解决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的新资源。但是,目前存在一些企图否定中国文化中的“普世价值”的言论,这种想法是十分错误的。坚持我们自身文化的“主体性”,是必要的也是理所当然的,但必须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以科学和开放的心态对待国学

什么是国学?顾颉刚认为,国学就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和历史材料,因此是一个研究系统。林语堂指出,科学的国学是我们治学的目标。因此,国学是指某一学问体系而非具体对象。国学研究尤其要注意多元文化的大趋势。早在20世纪30年代,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和钱穆四大导师就强调,国学研究不能孤立于世界。

清华大学国学学院院长陈来提出国学发展的四个阶段较好地概括了我们对待国学研究应有的态度。他指出,延续清代考据学、训诂学,加上近代意识是国学发展的第一阶段。如章太炎《国故论衡》不

突出“经”,而突出“子”,并对孔子有所批评(反对甲骨文研究)。第二阶段是胡适、毛子水等强调科学方法和疑古思潮的出现。汉学化的国学与世界学术研究接轨是国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如王国维、陈寅恪“把地下的实物和纸上的遗文互相印证”,“外来的观念和固有的材料相互参证”,“异国的故书和吾国的古籍相互补正”,与法国和日本的汉学研究接轨。当时在宗旨和实践方面都强调利用东方的古语言学、比较语言学来研究中国文化,与国际汉学界相一致,并得到他们的推重。陈寅恪始终和世界上的汉学研究联结在一起,在世界学术网中建立了中国国学研究的地位,他还提出,国学与国际汉学的接轨,而非排斥汉学或外国人对中国的研究(只有中国人才懂得中国),关键是要有一个开放的视野。第四阶段提出“中国主体,世界眼光”,强调西方汉学是西方学术的一部分。我们要领导世界新潮流,不仅要与世界合流,而且要成为主流。

文化上的“欧洲中心论”已经破产,西方人文主义发展面临困惑,世界各地的学者在重新思考发展的新方向。中国文化因此引起了国内外学者更多思考和关注。对此,我们要谨慎诸如“中国中心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文化可以拯救世界”的概念——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而是应该鼓励并倡导多元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促进新时代的文化多元化。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文学系)

东亚学研究

把地方文化、人文特色融入亚洲地区研究

1978年成立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UBC)亚洲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Asian Research, IAR)如今已步入而立之年。30多年来,IAR一直在加拿大的亚洲研究,特别是在当代亚洲研究领域占有重要的位置。它始终注重对亚洲地区跨学科知识发展的密切关注,侧重亚洲各国和地区的策论性研究,同时将温哥华特有的地方文化与人文特色融入其中。

追溯历史,1961年美国的太平洋国际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在麦卡锡主义泛滥这一特殊背景下被迫关闭,其所长Bill Holland接受了UBC的聘请,成立了新的亚洲研究系。1970年,UBC又创建了亚洲与斯拉夫(Slavonic)研究所,以适应日益增加的亚洲和远东研究的教师数量。1977年,部分亚洲研究人员独立出来,亚洲研究所正式成立。

经过30多年的发展,IAR的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印度、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部分国家,极大地促进了UBC与这些国家各个领域的合作,也为亚洲研究领域学者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很好的平台。研究所开设了加拿大最早的亚太政策研究生项目,倡导在整个大学范围内进行关于当代亚洲的跨学科研究。它同时也是一个政策咨询中心,为促进加拿大与亚洲各国的文化沟通以及亚太地区间的理解与对话提供了一个窗口。亚洲研究所目前的主要研究项目有全球化对亚洲的影响,贸易与人权、自然资源与可持续

性、社会经济与政治转型、加亚关系、亚太地区的移民与流动性、太平洋沿岸地区的都市化、政治与法制改革和贫困管理环境政策等。

多元化和国际化是UBC的一个重要特色,超过20%的研究生来自世界各地,而亚洲更是重要的生源。在UBC的1800名教职人员所做的研究中,10%左右的研究与亚洲有关。该校与亚洲很多国家的高校和研究机构有着密切的交往与联系,如“三三协议”(UBC、蒙特利尔大学、多伦多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之间的合作机制)。

《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是亚洲研究所主办的著名刊物,也是英语期刊中最早进行亚太地区研究的。自1982年创刊以来,它一直在国际上享有盛名,为亚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太平洋事务》每一期内容都涵盖了当前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问题,每个领域有5篇左右文章和40—50篇书评。

亚洲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创建于1992年,它的宗旨是:强化UBC的中国研究;鼓励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和海外大中华地区之间的互动与合作,促进加拿大与这些地区之间的关系;促进中国研究领域的教师、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之间的互动;加强中国研究学者与其他亚洲研究学者之间的联系;通过在地方社区开展各项活动,加深加拿大政府和民众对中国的了解。

(张颜语/编译)



环球学讯



李侃如:中国会怎样解读奥巴马的国情咨文

美国东部时间2010年1月27日晚(北京时间1月28日上午),美国奥巴马总统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了2010年国情咨文,介绍他对当前美国国情和未来的构想。1月29日,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围绕中国将可能如何解读奥巴马总统的首个国情咨文发表了见解。他认为,中国理解奥巴马的改革着眼于长远目

标的良苦用心,但更关注的是其改革方案能否得到国会的认可,从而将改革落到实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潜流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重估人民币币值、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等,然而,美国自身却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力不从心,对此中国存有一些疑虑和担忧。他指出,中国的态度将是察其言,观其行,关注国情咨文的后效。

牛津大学出版社新作《圣:新儒学的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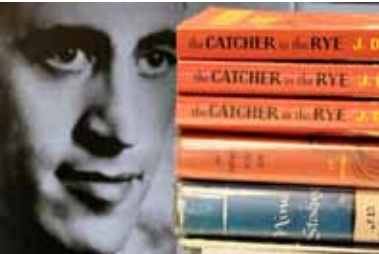
美国著名汉学家安靖如(Stephen C. Angle)教授最近出版了《圣:新儒学的当代意义》(Sagehood: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Neo-Confucian Philosophy),它从多个角度探索了新儒学哲学,同时也是首部讨论儒学传统与当代西方德性伦理学代表人物之间恒久对话的专著。本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了“圣”、“理”、“德”与“和”这四个关键词,第二部分从伦理与心理角度探讨了新儒学,第三部分则从教育和政治领域研究了新儒学。《圣》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当代儒家哲学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二是论证了西方哲学家研究新儒学传统的价值。

《麦田里的守望者》作者塞林格去世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于2010年1月27日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家中去世,享年91岁。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今天的当代美国文学中,有两部小说经过30多年时间的考验,已被公认为“现代经典”——黑人作家拉尔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的《无形人》和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麦田里的守望者》发表于1951年,是塞林格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全书以出身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16岁中学生霍尔顿·考尔德的口吻叙述,塑造了美国当代文学中最早的反英雄形象之一。该书一经问世便风靡全球,在青少年中引起强烈共鸣,至今仍十分畅销。

塞林格1919年生于美国纽约城,父亲是做干酪和火腿进口生意的犹太



商人,家境相当富裕。塞林格15岁那年,被父母送到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军事学校里住读,据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关于寄宿学校的描写,很大部分是以那所学校为原型的。1936年,塞林格从军事学校毕业,取得了他平生唯一的一张文凭。除著名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外,他还出版过短篇小说集《九故事》(1953)和中篇小说集《弗兰尼与祖伊》(1961)、《抬高房梁,木匠们 西摩:小传》(1963)。

(李萍、怀畅、国飞/编译)